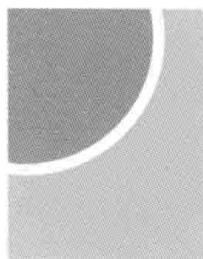


尚文华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西方哲学研究丛书

自由与处境

从理性分析到生存分析

尚文华 著

Freedom and Context:
From Rational Analysis to Existential Analysi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与处境：从理性分析到生存分析 / 尚文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203-3075-6

I. ①自… II. ①尚… III. ①自由—哲学思想—西方国家

IV. ①B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045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郝美娜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6.5

插页 2

字数 449 千字

定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资助出版

序 言

自由：从形式性到生存性的回归

西方思想史关于自由一词的界定，从古希腊开始，就是生存性的。我们通常说，自由就是不受外在约束而为所欲为。但是，怎么样的生存状态才是为所欲为呢？柏拉图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分析。他从“人皆求善”这一命题出发，认为人人都想过一种善的生活。但是，他在分析人的现实生存时，发现人往往生活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求善而得不到善。他的论证思路并不复杂。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人是追求的善的生活的；人的生存是在判断选择中进行的；在判断选择中，人所依据的是现有的善观念；如果人所拥有的是善恶混淆的善观念，那么，人在判断中就会善恶混淆，从而过着一种弃善择恶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所追求就不是善，而是恶，从而无法满足自己的求善生活。因此，柏拉图推论到，人要满足自己对善的生活的追求，他的善观念必须拥有真正的善。从真正的善出发进行判断选择，就可以满足自己对善的生活的追求，从而过一种自由的生活。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如何才能过这样一种在真正的善的主导下的自由生活？——这个问题引导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关于自由概念的讨论。

一直到近代哲学，在主体理性主义思路中，人们关于自由概念的讨论才渐行渐远地离开直接生存关注。主体理性主义突出理性的作用，认为人的判断选择可以是完全理性的，从而把人抽象为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康德称之为“理性人”。于是，自由就被界定为：抽象个体完全根据理性进行判断选择。这便是所谓的抽象自由。当然，人是在理性中判断选择的；但是，人同时也在情感中判断选择。当主体理性主义者仅仅在抽象自由意义上谈论人的自由时，人的自由就丧失掉其具体的生存内容。比如，康德在分析自由概念时，把信仰这种情感的内容抽空后，用一种抽象的上帝理念

作为信仰对象，以此替代基督教信仰的具体指向（耶稣基督）。这种缺乏生存内容的自由仅仅是形式上的，但不是现实的。或者说，它也属于人的生存的某个方面，但需要一系列的环节才能使之与人的现实生存联结起来。

有一个思想史事实值得注意，那就是，在抽象自由观念中，思想家们推演出了自然状态中的“个人自由”这一观念，并通过契约论而把个人自由转化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权利”。这些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从个人权利观念出发，展开了关于政体问题的激烈而深入的讨论，引导了一种以宪政思维方式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这种宪政思维彻底改变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看来，虽然抽象自由在概念界定中与人的现实生存有些脱节，但是，一旦转化为政治哲学的个人权利，它就开始改变人的政治视野，并与人的政治生活直接挂钩，引导着一种新的政治生活理念和实践。可以说，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在引入西方的自由概念时，先是谈论作为权利的自由，进而着迷于康德式的抽象自由，但就是未能对自由概念进行全面的思想史追踪。于是，当人们企图复制西方的做法而在中国实践宪政理念时，很快就发现，离开了西方思想史语境，这种抽象自由和个人权利观念如同陆地造舟，虽然船体造的美轮美奂，但是，它缺乏足够的水量来而下水航行！充其量，它只能在陆地上靠外力推动而挪动数尺而已！实际上，直至如今，中国思想界对自由概念的理解仍然在这种抽象自由的幻象中，内容贫乏，死气沉沉。它仅仅是一个令人产生幻想的概念，而不是能够引导人进入生存的理念。

2007年，我出版了《自由与生存》（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企图就自由概念通过原始文献的分析和讨论，呈现西方思想史中的主导性发展线索，推动中国思想界全面地进入并把握西方的自由概念。我在本书中呈现的自由概念是一种生存性的自由。出版后，我才发现，中国思想界完全受制于抽象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观念中，一时跟不上这本书的思路。有读者甚至认为，这本书无助于理解西方自由概念！我很快就意识到，中国思想界消化这本书尚需时日。当然，如果我们愿意继续呆在抽象自由中而自娱自乐，幻想着那无法落实在生存中的自由，说实话，那就意味着我们自甘堕落！西方思想史从柏拉图开始就没有停止过讨论自由概念。这些讨论

作为思想性资源具有原始性意义，根基于人的生存关注中，并且仍然不断地孕育着人们对自由的新理解。我们的自由需要回归到现实生活中！

在中国思想界目前的这个困局中，尚文华的《自由与处境——从理性分析到生存分析》的出版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新的清新空气。我希望它能够在我们努力走出这个困局的挣扎中增加我们的力量。文华博士一直致力于康德研究，在康德式的抽象自由中浸淫多年，也因此对抽象自由之生存内容的贫乏有深刻体会。他使用“形式性自由”来指称这种抽象自由，并有意识地对形式性自由和生存性自由作了相当到位的区分。在总体思路上，他希望通过追踪近现代思想史关于自由概念的讨论来引导读者进入生存分析，呈现生存性自由概念。

有一点我想特别指出，在文华博士的分析和讨论中，情感成了一个关键词。理解当然是理性的；但是，如果情感缺位，我们的理解就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方向。简略而言，我认为，人通过自己的感官和外在的感觉世界发生关系，认识它，并在自己的认识中与之相处。同时，人也通过自己的情感和外在的情感对象发生关系，并在情感中认识它们，进而在自己的认识中与它们相处。情感分析向我们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周边世界。它在认识论上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的外在世界，也在生存上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可能生存方式。推动中国思想界重视情感分析，这也是我这些年来的努力。愿文华博士这本书的出版成为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点是无疑的，让自由成为一种生存性力量，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是为序！

谢文郁

2018年5月9日

济南

前言 分析视角和问题的形成

近现代西方思想史的自由概念是一个热门话题。不过，目前学界对自由概念的讨论大都是在政治哲学视角中进行的。在这个思路中，人们认为，从马基雅维利到卢梭对自由的探讨从属于近代政治哲学的建构过程，因而这里的自由概念乃是政治自由主义观点下的自由；而从康德到黑格尔、马克思则是在哲学的——存在论的意义下的追踪自由概念，并将之建构为一套套体系，这些体系意味着哲学或思想的终结。在这样的分析视角下，对自由的追踪就只是从属于近代启蒙以来的理性传统。而由此来看，齐克果、尼采等乃是非理性哲学家，等等。同时，这个思路还有一个预设，它认为信仰是理性的蒙昧状况；宗教则是需要放弃的生存方式，等等。在汉语学界，这个思路目前仍然有强大的掌控力。

与这种理性的建构视角不同，本书希望从宗教哲学式的分析视角出发讨论近现代以来的自由概念。宗教—信仰强调人的生存中的接受性维度；哲学—理性则强调人的生存中的自主性维度；宗教—哲学的视角则试图把生存中的接受性维度和自主性维度接受下来，并在两者的张力中讨论人的生存。在这样的视角中讨论自由，就是在人的两种生存张力中理解人的自由。在这里，笔者试图在这种生存张力下分析近现代思想史的几位重要思想家关于自由概念的讨论，追踪并呈现自由概念在其中的发展线索。简略而言，近现代思想家在呈现自由概念时主要从理性分析、信仰分析和生存分析这几个分析维度展开。就其形态而言，这段思想史呈现了“理想型自由”“接受性自由”以及“处境中的时间性自由”这三种自由观。

在展开具体的讨论之前，笔者想就此问题意识的形成、宗教哲学的分析方法、文献综述以及主题论证等四个方面勾勒本书的写作动机和完成状况。

一 问题源起

硕士期间，笔者完成一部讨论康德宗教哲学的专著《希望与绝对——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思想史意义》，^①完成之后，一个更庞大的研究计划开始成形：康德的问题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他对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的影响有多大？进一步，其引领的古典传统如何引导了“背叛”的齐克果，齐克果又怎么影响 20 世纪“现象学—存在论”和基督教神学？在追踪康德问题意识及其对后续思想家的影响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一系列经典文本所呈现的意义远远不是既定的思想史框架所说的那个样子——按照既定的哲学——思想史框架（主要在黑格尔影响之下形成）：从霍布斯到卢梭，直至康德乃是政治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的过程，从此之后，历史和思想史就终结了；齐克果对黑格尔所代表的哲学传统的背叛只是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或齐克果只是位“存在主义”或“生存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也被萨特称为与之同类的存在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一句话，近现代思想史就是理性的发展史。

但实情如何呢？黑格尔的理性体系不可谓不庞大，马克思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理想不可谓不美好，这些理性体系也确实达到人类所能想象的顶峰。但是，这样宏大和美好的体系能给人具体的生存带来什么呢？正如齐克果批评的，在这里，除了理智的安慰，人并没有其他什么。人是具体地生存在当下之中的，宏伟的体系能够把人带入一种生存方式之中，但人的实际生存更多地乃是需要面对、并时时要面对无限丰富的可能性，这既是生存丰富性的需要，也是人不得被逼迫进的境遇。因此，一旦真实地面对生存的无限可能性境地，这些宏大的体系可能会瞬息崩塌，什么都不会留下。不仅齐克果的感受如此，我发现，卢瑟福、霍布斯、卢梭、海德格尔，甚至康德的文本都能传达出这些感受。

随着这些感受愈来愈强烈，我开始尝试着用学术的语言表达和传递这种深刻的生存感受——从“晚期希腊—早期基督教”开始，人们就将之表达为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中体察经典思想史文本传达出

^① 书稿在 2012—2014 年间完成，由于种种原因，之后的出版流程有些漫长。具体参阅拙著《希望与绝对——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思想史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来的意义，远比按照从黑格尔开始形成的理性框架要丰富得多，并且也更加贴近思想史本身的发展。后者之所以成立，是很容易想象的。霍布斯不可能在基督教精神掌控欧洲的状况下，神奇地思考理性的所谓“自然状态”，齐克果也不可能仅仅凭借所谓的“非理性”状态哲学解构黑格尔庞大的理性体系。因着对理性和信仰张力的这些体察，我把既定的近代政治哲学发展向前推进了一环，即：从作为神学家和牧师的卢瑟福开始追踪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发展。

为了对抗“君权神授”论，卢瑟福的圣经解释确定了近代“神学—政治”的双重出发点：上帝主权和人的生存自卫权，从而把人的生存的自由引入思想史的发展，这才有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以至于到洛克的圣经解释时，个体自由开始成为自明的出发点。同样地，康德充分注意到，理性体系的完成离不开人的生存，因而在其看起来处处捉襟见肘的论证中，隐藏的是其对生存中理性和信仰张力的深刻体察。但是，遗憾的是，或者出于理性自身论证的目的，或者出于自身的短视和狂妄，黑格尔等人沿着理性理想走到了极端，以致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西语学界看，近百年来，学者们在舔舐历史残留给他们的伤口，他们或者致力于揭示“理性—现实”带给人的灾难，或者致力于为他们开脱，认为，他们只是充当了理性论证的工具而已，不必为历史本身负责。

与西方学界相比，中国学界尚未真正消化近现代理性体系，因而不能承担其带给人类，尤其是带给中国人自己的生存困境；甚至除了感受到现实生存状况带给我们的困境外，我们尚未真正体察到理性思想本身的困境。在我看来，这缘于我们无法进入理性和信仰的张力，也就不能真正进入这些经典文本所表达出来的实际的生存内容。缺少了信仰的维度，人的生存就是狂妄；缺少了理性的维度，也就没有了顶天立地的人的生存。就目前中国学界每天都在发生的很多事情来看，这两类人——即：缺少信仰体察的和缺少健全理性的学者——不在少数。这种状况的改观，依赖于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和漫长的时日、境遇的变迁。

在这种深层的现实困境——既是生存和思想本身的困境，更是中国人需要承担的自身的困境——面前，我想传达我从齐克果这里领受到的东西。即：通过进入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无限可能性状态，追踪“自由”的思想史，批判对“自由”进行掩盖的理智—理想建构。很明显，这种追

踪方法是宗教哲学式的，是直面具体的人的生存——历史现象和现实的；这里呈现出来的“自由”，也绝非理想的建构的自由，而是具体的当下的处境中的自由；我们所生存的自由的世界也绝非理想的建构的世界，而是由爱所开显出来的处境中的生活世界。我相信，对于现时代的人来说，这种追踪是有深刻的生存意义的。

交代完学术性的背景之后，我还想具体谈一些学界之外的与现实有关的问题。长期以来，谈起宗教，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是“五体投地”“烧香拜佛”，或者“离群独居”“刻苦修行”“公共崇拜”等。但是，坦白地讲，这些只是宗教的表面现象。它们背后，是人内在的灵性上的争辩和挣扎，是试图凭自己的能力做什么，但总是又意识到“己力不足”后的依靠交托，这是我们生存内在的理性与信仰之间永恒不息的张力。本书试图呈现的就是在理性和信仰张力之下的西方近现代自由观念的变迁和发展。借这一主题，我们试图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对宗教刻板单一的看法，让人们更深地看到：宗教既非蒙昧，又非神秘莫测，相反，宗教性的张力一直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它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同时，作为长期关注宗教的一名宗教学研究学者，通过分析使宗教呈现出其本来的面貌也是我的职责。

二 分析方法

哲学是理性的学问，它用概念追问存在；或者说，用概念划定存在的边界。在概念所能划清的领域内，一切都是被照亮的。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性哲学遵循了这些，它试图沿着一个自明的起点推论出理性概念所能包含的一切，并以此划定人的行为边界。就此而言，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本来就是一回事。在这套理性思维方式里，人的生存是有方向的，并且人乃是主动地支配其生存，即：理性的生存方式乃是最终的理想生存，人凭其理智主动地走向这种理想的生存。总之，理性具有现实性。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生存丧失了真正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能走向理想方向的生存本身乃是封闭于体系中的、没有其他可能性空间的生存。在我们的生存体验中，我们确实总是沿着自己理解的方向做着生存选择，但同时，我们也体察到，生存中总是出现“莫名”的因素，它不断地干扰并重构着我们的生存选择。也就是说，人的实际生存既是被理性构

造的现实性推动着，又被理性现实性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推动着。我用“宗教—哲学”这一术语表达生存中的这两方面因素。它既考虑到理性的主动性层面，同时又着重刻画生存中的“异在”要素；对于不同于理性建构的生存要素来说，我们对之是接受性的，并在接受性中试图去理解它。因此，人的生存是由主动性和接受性所共同推动的。注意到生存中的这两种要素，并在两者的张力中分析经典文本或具体生存，被称为“宗教哲学的分析方法”。

特别地，分析宗教性的情感是这种分析方法最好的展示。之所以是“宗教性的”情感，乃在于这种情感所指向的对象对于人来说不是主动地构造出来的，而是在接受性中呈现的。信仰，总是对上帝的信仰；爱，总是对上帝的爱；着急，总是对无法把握的可能性的着急；并且，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爱、对可能性的着急不是空无意义的，相反，它们能够影响，甚至主导我们的生存选择，为我们已经凝固了的经验和思维模式打开新的空间；让我们更深地看到，在习以为常的生存模式之外，有更强有力的生存可能性向我们敞开。因此，情感，尤其是宗教性的情感并非一种消极的情绪，似乎只有理性才是唯一的支配性力量，相反地，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情感对我们生存的有倾向的推动乃是在于情感所指向的对象的强大力量，并且宗教性的情感所指向的对象往往不是纯粹的理性对象。就此而言，宗教性的情感所指向的对象远不是主体理性所构造出来的理性对象，它对人的生存的影响和主导就不是理性的理想生存方式所能限定的。

因此，对宗教情感的分析使我们突破了传统理性哲学的生存和思想框架。它让理性的理想生存暴露出局限性，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这是一种面对无限的可能性的生存。之所以称之为“无限可能性的生存”，乃在于理性的理想生存乃是封闭于理想的，不能有其他可能性进入的有限的生存。尽管康德和黑格尔等人也在谈论生存，也在谈论生存中的选择，这些选择也是在具体的时空“处境”下的，但是，在宗教哲学的分析看来，这是一种封闭于理性理想的生存，其生存方向是固定的，生存选择名义上是处境性的，但由于选择方向已定，处境只是在当下选择更好的实现方式而已，这里没有任何异在的生存因素的进入。

相反地，由于情感对象远不是理性所能操控的，由宗教情感所推动的生存乃是时时刻刻面对可能性的生存，任何生存选择都不是已经确定的。

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生存乃是时刻面对异在因素的，是时刻需要聆听、需要接受异在因素的；同时，我们的生存也时刻在判断着，选择着。即：我们的生存乃是在自己的判断和对异在因素的接受的张力中展开的；每一个选择瞬间都是处境性的，时刻性的，甚至可以说都是“决断”，这里没有所谓更好的实现方式问题。

上面我们提纲挈领地界定了我们的宗教哲学分析方法，也说明了这种方法对生存、处境等核心概念的独特界定。在下面的思想之旅中，我们就在自主性和接受性、理性和信仰的张力中解读从卢瑟福到卢梭，以及康德、黑格尔、齐克果和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文本。我们要在信仰的接受性和理性的自主性的张力中挖掘从卢瑟福到卢梭对自由概念探讨的演变；分析康德和黑格尔文本中的内在张力，以及理性建构对宗教性的生存方式的压制；分析齐克果对宗教情感的分析所揭示出的宗教对象，以及这些宗教对象与哲学化的对象在认识上的差别；分析海德格尔对齐克果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生存论的分析方面。我相信，只要细心地体察这些分析，读者肯定能得到不同于既定哲学史的一些东西。

三 文献综述

本书对近代政治哲学的追踪起始于卢梭的论断，即：基督教国家的存在是个生存悖论；更明确地讲是两个权力中心所引起内心的和外在的征战。在文本上，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卢瑟福。检索有关卢瑟福的西语文献，我们会发现，西语学界长久以来根本不重视卢瑟福对“双重出发点”——人的自卫权和上帝的绝对主权——的论述，^①但它却对我们摆脱已经形成的政治哲学框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之相对，本书则意在深入分

① 英语学界主要从现代法律层面讨论卢瑟福（Shaun Alberto de Freitas, *Law and Federal - Republicanism: Samuel Rutherford's Quest for a Constitutional Model*, 2014. 等），教会内部也有讨论卢瑟福解释圣经的著作（Robert Gilmour, *Samuel Rutherford: A Study Biographical and Somewhat Critical, in the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Covenant*,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4; John Coffey,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British Revolution: The Mind of Samuel Rutherford," *Cambridge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British History*, ed. Anthony Fletch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等），但对于卢瑟福思想所表现出来两个生存出发点的关注却鲜有涉及。这不得不说是很大的遗憾。我能找到的只是 Ryan McAnnally - Linz (2013) 的一篇文章，和 Ross Harrison (2003) 中涉及卢瑟福的一些文字，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澄清了问题意识。

析卢瑟福的信仰和生存，并以其解释圣经所带出的双重出发点为契机，引入霍布斯的自由问题的生存出发点，从而一步步从生存出发点的意义上追踪到卢梭和康德。

汉语学界比较关注这段思想史，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主要受制于西语学界。^①细致阅读西语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大跨度讨论这条思想线索的著作明显受到黑格尔哲学史的影响，他们或者把从霍布斯到卢梭理解为形而上学问题的形成和解决；^②或者仅仅理解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完成，而未曾注意到这些文本内在的与信仰和宗教争辩的张力；^③即使在全面评述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文集中，除了讨论他们的思想对后续宗教的影响外，而未曾注意到《利维坦》《政府论》《社会契约论》等内在的理性与信仰的张力，^④这不得不说是思想史本身的“偏差”阅读——这缘于将近代思想史哲学化的倾向。只有极少数作者注意到这种状况，他们或者致力于揭示霍布斯或卢梭等人思想中的生存张力，或者试图从宗教争辩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代政治哲学的形成。^⑤

① 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哲学界，汉语学界都有不少研究。但是，坦白地讲，法学界研究的思想水准普遍不高，我们会在后续的注释中有所评述。在哲学界，有不少论文是在总体上研究这段思想史的，其论义宏大，但可能在论证逻辑上需要更细致的分析。比如，胡兴建，2012；伍俊斌，2011；李猛，2013（b）；等等。也有学者将其与现代政治哲学家的研究进行比较，比如罗尔斯、诺齐克、施密特等人，比如，陈建洪，2008；等等。与之相对的是，黄裕生教授和李猛教授的单篇研究论文，很好地把握住了问题，比如，李猛，2012、2013（a）；黄裕生，2012、2014（a）、2014（b）；等等。我们会在后面的注释中对之有所深入评述。孙向晨教授早些年的一些文章注意到近代政治哲学的神学维度，在我看来，这是很重要的且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启发。参阅孙向晨，2005、2006、2007。特别地，在此，我想介绍谢文郁教授的《自由与责任四论》（谢文郁，2014年）一书，它沿着正义概念追踪了这段思想史的发展，并充分注意到基督教对这段思想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会在后面加以具体的讨论。与之相关的是，这些年来我们或者从“自由主义”视角理解这段思想史，或者从“国家主义”理解它，我在正文会对之有所评述。有关中国学界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我为谢文郁教授《自由与生存》一书所作的评论中有所阐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尚文华，2016。

② 参阅 Asaf Z. Sokolowski (2011)、Glen Newey (2014)、Timothy O' Hagan (1997) 等。

③ 参阅 Andrzej Rapaczynski (1987)、Matthew H. Kramer (1997)、C. B. Macpherson (2011)、Gordon Hull (2009)、Matthew Simpson (2006) 等。

④ 参阅 Patricia Springborg (2007)、Joseph Loconte (2014)、G. A. J. Rogers and Tom Sorell (2000)、S. A. Lloyd (2013)、Lee Ward (2010) 等。

⑤ 参阅 Michael P. Zuckert (2002)、Jeremy Waldron (2002)、Kevin Inston (2010)、Lee Ward (2014)、Eve Grace (2013)、Ross Harrison (2003)、Jimmy Casas Klausen (2014) 等。

在具体问题上，我们的分析受惠于皮埃尔·莫内（Pierre Manent）较多。作为当代法国政治哲学界的领军人物，Manent 对政治的很多观察都得到西语学界，甚至政治界极大的关注。他也充分注意到基督教对近代政治哲学形成的重要意义，认为，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开端，^①并且这些经典思想家们的文本或者是在基督信仰和理性分析的张力中完成的，或者是在与宗教的对峙中完成的，尽管其最终的目的是人自身的完成。^②

我们正文中的很多论证受到 Manent 的启发。2012 年前后，Manent 对卢梭的自由概念的解释开始引起我的注意，在后续的阅读和思考中，我开始沿着他所追踪的政治哲学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的阅读。可以说，本文第一章是在 Manent 先生的影响下完成的。在中国学界，谢文郁教授和黄裕生教授也都有一系列追踪这段思想史的文章。^③我的宗教分析方法主要受惠于谢文郁教授，在试图按照宗教哲学分析的路径展开这段思想史的时候，我与谢老师交谈甚多，也多次从他那里得到真知灼见，尽管在诸多问题上，我们也总是在争辩着。

梳理出从霍布斯到卢梭的发展之后，我们看到，思想史进入了理性的建构模式，这尤其体现在康德和黑格尔的文本里。此部分的写作以我 2018 年刚刚出版（但完成于 2012—2014 年间）的专著《希望与绝对——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思想史意义》为基础。在那里，我梳理并分析了大量与康德宗教哲学相关的文本，^④以及康德哲学对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体

① 参阅皮埃尔·莫内，2011。汉语学界对 Pierre Manent 有两种译法，“莫内”（曹海军）和“马南”（崇明、倪玉珍），除了引注外，本文一并用原名。

② 参阅 Pierre Manent (1998a、1998b、2006)。

③ 参阅，谢文郁，2013、2014；黄裕生，2012、2014 (a)、2014 (b)。

④ 我们的康德分析主要侧重于揭示其思想所呈现出来的生存张力，这是宗教哲学性的研究。早期英语学界即使在其宗教哲学问题上都对此阐释不够，他们主要是从理性建构方面理解康德。可以以 Allen Wood 为代表，其 1970 年的《康德的道德宗教》尚且有“道德宗教”这种不太恰当的术语，到 1978 年，已经改为《康德的理性神学》，仔细体贴这两个文本，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对道德法则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差异，到 1998 年，其翻译的《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已经明显感受到理性和信仰的张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比较 Wood 和李秋零教授的译本，语言感觉上差异很大。Wood 的感觉基本代表了英文学界对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进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Allen Wood (1970、1978、1998)。笔者也有专著专门讨论过这些问题，可参阅尚文华 (2018)。

系形成的重要影响。^①不同的是,我们这里从批判康德哲学和黑格尔体系入手,指出,康德哲学不能支持政治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②黑格尔的体系遗忘了具体的人,进一步我们从学理上批评了“国家”^③理想;也指出马克思对这些体系的批评,这集中体现在其有关“共产主义”的想法。^④就此而言,我们的分析不同于西语学界一般的研究路径。

西语学界的齐克果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之前和之后。2000年之前,学者更多地沿着存在哲学的角度把握齐克果,这导致思想界不能直面齐克果思想中时时出现的信仰和其他各种激情,或者将其形式化为哲学框架,或者直接将之称为非理性的。这也是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哲学史研究框架。但进入2000年之后,学者们开始真正进入齐克果的信仰分析和生存分析。比如,本书着重分析的爱的情感和伦理世界问题,2000年之前,很多学者不承认齐克果的“爱”是一种人的爱,也不

① 康德对黑格尔“绝对理性”论证的影响,以及对施莱尔马赫新宗教观的影响,都以单篇论文发表出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尚文华,“理性论证的基础:道德原则,还是爱的精神——论黑格尔对康德理性体系突破的起点”,载《宗教与哲学》,第五辑,2016年;“从自主性到接受性——论施莱尔马赫的新宗教观”,载《基督教思想评论》,第22辑,2017年。

② 坦白地讲,这里对康德体系的展开稍微不同于《希望与绝对》。我在这里更侧重从形而上学的建构论的角度叙述康德,目前西方学界徘徊在形而上学建构论和两种立场分析论之间。进入2000年后,John Rowls (2000)认为康德“敬重感”是自然情感,因而主张康德体系是形而上学的分裂,Karl Ameriks (2010)和Benjamin Lipscomb (2010)则主张“敬重感”是生存现象,是联结人的自身存在和现象存在的桥梁。这就把形而上学解读和生存立场性的分析的张力表现出来。Jeanine Grenberg (2010)尽管主张形而上学立场,但其仍然重视从现象学的分析入手,这证明两种立场在走向融合。对于中国学界的康德来说,指出这些是重要的。

③ 有关黑格尔“国家”理想的研究文献很多。大致说来,有学者仅将之理解为理念,即使其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但还是可以从理念自身运行方面理解黑格尔——类似政治神学的解释,因而黑格尔不为历史的血雨腥风负责,比如,Eric Weil (1998)、Paul Lakeland (1984)、潘能伯格 (2014),等等;更多地是把国家理想理解为国家的实现过程,因而在生成中理解自由的现实性,比如,Merold Westphal (1992)、Paul Franco (1999)、Frederick Neuhouse (2000)、Dieter Henrich (2004),等等;特别说一下,Dieter Henrich (2004)是此类解读中值得阅读的一本;值得一提的是,L. T. Hobhouse (1998)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批判黑格尔形而上学国家抹杀了个体性和特殊性,其结论与我们相同,但分析路径不同。

④ 比如,进入2000年之后,就有很多专门研究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文献。他们更侧重于历史和政治方面,可参阅Darren Webb (2000)、Westport F. Busky (2002)、Ribert J. Sims (2004)、Robert Service (2007)、Mark Sandle (2012),等等;但也有试图将其与现代分析的伦理传统相比较,参阅David Leopold (2007)。我们的研究和批评更侧重于生存分析的层面。

认可齐克果的分析的伦理性；^①2000年之后，人们接受了爱的伦理性，^②并致力于解释爱的人的层面（浪漫之爱）和神的层面（邻人之爱）之间的关系。^③

我的齐克果的信仰分析和生存分析及其自由概念的探讨，主要受惠于谢文郁教授^④；对爱，及其伦理性的探讨，尤其对爱的探讨，我要感谢 M. Jamie Ferreira (2001) 的出色工作，她的分析和梳理几乎穷尽了2000年之前西语学界的齐克果的“爱”的讨论；除此之外，我们还主要参阅了 Amy Laura Hall (2004) 和 Sharon Krishek (2009) 的工作。这些阅读和阐释与我自身对这个时代所陷入的困境的体察息息相关。在中国，我越来越感觉到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是“爱”里的贫瘠者，“爱”对于我们走出自身，直至走进他者，走进上帝是最重要的。或者反言之，只有在信仰中，我们才“会”爱，才有爱的能力，而一旦有了爱的能力，一个真正的伦理世界才是敞开的。把 Amy Laura Hall 和 Sharon Krishek 的论述综合起来，表达的正是这一主题。可以说，对《爱的作为》的阅读和理解，对中国当下状况的沉思，让我有勇气言说“爱”这一主题。

对《致死的疾病》的阅读，主要是我自身经历的表达，经历“恩典时刻”体验之后，我能感觉到这部著作每句话都是在批评康德和黑格尔体系——在阅读英文文献时，我尚未读到如此解读这部著作的文献。我想，这与我曾经完全被主体理性所掌控有关，因而走出之后能深刻地体察到主体理性的致命之处。对《哲学片段》的阅读，可以说是与谢文郁教授一起完成的，那次读书班对我理解齐克果意义重大。在读书班上，我与

① 参阅 Theodor Adorno (1940)、Emmanuel Levinas (1963)、Irving Singer (1987)、David Gouwens (1996)、Kund Ejler Løgstrup (1997) 等。

② 参阅 Philip L. Quinn (1998)、M. Jamie Ferreira (2001)、George Pattison (2002)、C. Stephen Evans (2004)、Murray Rae (2010, Chaper 7) 等。

③ 参阅 Amy Laura Hall (2004)、Sharon Krishek (2009) 等。

④ 参阅谢文郁，2007。总体上讲，汉语学界许多著作更侧重于从生存哲学方面解释齐克果，而对其基督教信仰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王齐教授是齐克果的研究专家，其分析思路一直在哲学层面展开；尚杰教授一直致力于法国哲学研究，也从法国哲学那里得来很多灵感用来研究齐克果；我们一直敬重的叶秀山先生也有文章讨论齐克果，叶先生是哲学家，自己坦言，很难从宗教方面进入齐克果的体察。此外，赵敦华教授，刘慧姝等都有相关研究，这些都是汉语研究需要特别提到的。可参阅王齐 (1996、2010)、尚杰 (2008)、叶秀山 (2013)、刘慧姝 (2006)、赵敦华 (2013)；等等。